

#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与 南京大屠杀论争在日本的终结

[日] 笠原十九司

## 一 共识——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

在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教育与记忆中,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残忍、残暴的标志性事件。与之相反,在日本却有一些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保守派国会议员、学者、文化人、教育家等公然宣扬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产经新闻》、《文艺春秋》、小学馆等保守派媒体也反复地鼓噪已经在学术上站不住脚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刺痛中国人民战争记忆的伤疤,引发了他们对日本人以及日本社会的抵触与质疑。甚至还因此出现了声称南京大屠杀是“哽在日中友好交流喉咙上的一根刺”的说法。

在2010年1月公布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书》)中,由日方执笔的近现代史部分“第二部 战争年代”的第二章“日中战争——日军侵略与中国抗战”专设“4. 南京攻略与南京虐杀事件”一节,用两页篇幅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经过、屠杀的内容。对牺牲者人数,作者在介绍了东京军事审判判决书中的20万人以上和南京军事审判判决书中的30万人以上的两种数字的基础上,指出虽然中国方面认为是30万以上,但“日方的研究以20万以上为上限,其他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肯定了南京事件是历史事实。该文执笔者是筑波大学教授波多野澄雄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第一战史研究室室长庄司润一郎。

由中方执笔的《第二章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中也分出一节“4. 南京大屠杀”,用两页的篇幅,引用事件发生时身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Lewis S. C. Smythe)的受害调查史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长德国人拉贝(John Rabe)、美国人记者德丁、斯蒂尔等人的记录,对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做了论述。文章还提到了强奸的频发与受害者人数,论述了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强迫许多中国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的事实。关于牺牲者人数,作者仅止于介绍在东京军事审判中认定“占领后六周内,南京市与近郊被杀害的平民与俘虏就达20万以上”,以及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认定“南京大屠杀中集体杀害的人数为19万人,分别杀害的人数为15万多人,受害人总数为30万人以上”的两项判决书的数字。

在《报告书》内,日、中双方的论文都把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对牺牲者人数也引用了东京军事审判与南京军事审判的判决书作为史料进行介绍,这一点双方是一致的。日本官方人士也应对这一结果充分认识。

正如拙著《南京事件论争史》(平凡社新书,2007年)已经详述的,在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论争中,否定派、虚构派的破绽已经在学术上有了定论,司法界在以家永教科书审判为首的与南京事件相关

的审判中也已有了判决——否定派败诉。《报告书》是在这些基础上从历史事实这一角度给出的证明。日本政府称“日中的历史问题交由专家判断”，从而把判断权交给了日中历史共同研究课题组，而报告结果业已表明南京大屠杀为历史事实。这意味着通过日中政府之间的历史共同研究，在南京大屠杀论争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结论。

今后要求日本政府当局尊重历史共同研究成果，扫清阻碍日中友好交流与信赖关系的“荆棘”，以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广大日本国民认识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

## 二 自民党政府双重标准的失败

战后的自民党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一直采取了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外表示接受根据《旧金山和约》第11条裁定日本战争为侵略战争的东京审判的判决，另一方面对内却在战争责任、侵略战争问题上，采取了否定的对应态度。<sup>①</sup>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文部省(2001年起改名为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审定，从否定战争的侵略性、加害性的方向上进行了赤裸裸地干预。战后，日本国内共进行了三次教科书攻击，其中第二、三次引发了中、韩等亚洲邻国的严重抗议，教科书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化问题。

自民党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的具体事例，还体现在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上。在《旧金山和约》日本所接受的东京审判的判决中，南京大屠杀被裁定为对普通市民进行的屠杀等非人道的战争犯罪(反人道罪)，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处死刑。但是，在日本国内，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官方人士却明里暗里一再坚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调，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中捏造出来的”。

拙著《南京事件论争史》以及拙稿《南京事件70年的日本与世界》(《历史学研究》No. 835, 2007年12月)已有详细论述，虽然作为官方意见日本政府在外务省网页上表示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但在国会议员中明确表示南京大屠杀为历史事实的声音很小，相反持否定意见的一派声音较大。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否定派势力公然举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舆论活动。其中有自民党国会议员组织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委员会”(会长为中山成彬，该会前身是1997年成立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委员会”)中设立的“南京问题小委员会”(会长户井田彻)、超党派“要求中国抗日纪念馆撤掉不当照片议员联盟”(会长平沼赳夫，副会长渡边周，事务局长稻田朋美，众议院、参议院共48名议员参加)等，不仅有自民党议员(包括退党人员)，也有一部分民主党议员。

民主党内部，由鹭尾英一郎等30余名众、参议院国会议员参加的议员联盟组织“民主党慰安妇问题与南京事件真相验证会”(会长渡边周，事务局长鹭尾英一郎)，反对“东京裁判史观”，邀请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等否定派讲师进行“验证南京事件的史实”活动(引自“入会邀请”宣传单)，以对抗“以南京事件为中心的反日宣传电影”。另外，2007年以“频道樱花”为首制作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的真实》，其制作委员会名单中公然罗列着自民党、民主党等部分国会议员的名字。

还有最近自民党政府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安倍晋三首相、麻生太郎首相等，一方面对中国、韩国、亚洲各邻国等声明将继续“村山首相战后五十年谈话”(1995年8月15日，以下简称“村山谈

<sup>①</sup> 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请参阅吉田裕著：《日本人的战争观——在战后史中的变化》，岩波书店1995年版。

话”)的精神<sup>①</sup>认识过去日本发动的战争,另一方面在国内实施的却是一套否定“村山谈话”的历史政策。小泉首相每年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安倍首相公然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麻生首相也参与第三次攻击教科书事件等。与其说是双重标准,不如说“演双簧”更为贴切。

此次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是在安倍内阁的双重标准之下以政府对外声明为基本原则开始的。即由麻生外相与李肇星外交部长之间达成一致的“实施框架”,确定“双方本着日中共同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原则,以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在实施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报告书》中的《序言》)。三个政治文件是指日中邦交正常化时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1972年)、按照该声明签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该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日的江泽民主席与小渊惠三首相之间签署的《日中联合宣言》(1998年)。在《日中联合宣言》中,“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按照这些原则,共同研究“认为在对战争责任双方有着基本的共同认识的前提下,进行学术性讨论,交换资料和意见,可以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缩短相互之间认识的差距”(《报告书》中的《序言》)。当然,这就造成《报告书》认定历代自民党政府在双重标准中的对内歪曲、美化侵略战争的立场上所作的教科书审定事务是错误的这一结果。换言之,自民党政府在过去的教科书修改中所删除或者是强制修改的有关侵略、加害的历史事实都得到了学术上的证明。

在《报告书》中,除南京大屠杀以外日中双方论文还对平顶山事件、毒气战、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强制征用劳工、日军“慰安妇”等侵略、加害的历史事实进行了严谨的论述。

因此,日本政府应认真理解《报告书》的内容,让担当国政的国会议员(尤其是保守派政党议员)仔细阅读、学习,从今以后停止已经被证明失败了的双重标准。具体来说,第一,停止对过去教科书攻击的目标——有关侵略、加害的历史表述——进行恣意的教科书审定;第二,文部科学省以下,中央与地方的教育行政机关要改变对在教育现场以上述事件为例进行侵略、加害历史教学工作进行压制性、统制性行政指导的情况。

### 三 不负责任的日本新闻报道

《报告书》公布前后,日本的全国性、地方性报纸都对此进行了包括社论在内的报道。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带有否定性质。他们以在南京大屠杀牺牲者人数问题上日本主张2到20万,中国主张30万为例,强调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背离,并将其原因全部归咎于中方。

比如《日中公布历史研究 南京大屠杀牺牲者人数上鸿沟》(《朝日新闻》2010年2月1日,以下省略2010年)、《南京大屠杀“2~20万人”“30万以上”历史认识上的日中差异》(《东京新闻》2月1日)、《历史认识的差异突出(社论)》(《读卖》2月2日)、《中国30万人日本20万人 南京大屠杀牺牲者人数差异 历史认识的“鸿沟”明显 相互理解之间难题堆积如山》(《山梨日日新闻》2月1日)等,仅罗列这一类报纸的标题,就足可见报道的态度。

日本的报纸只抓住南京大屠杀(南京事件)在牺牲者人数上日中的不同表述,以此强调两国历

① “村山谈话”对日本的战争是这样叙述的:我国在过去不太遥远的一个时期内,错误的国策使日本走上了战争道路,日本国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为避免将来重犯这样的错误,我毫不怀疑地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也向所有在这段历史中死难的海内外人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在迎来战败五十周年的今天,我国进行深刻的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须推广和平的理念与民主主义。

史认识的“鸿沟”、“差异”，似要把国民的视线从认定南京事件为历史事实这一共同研究的成果上转移开来。上述内容显而易见，日本报纸报道中方委员坚持牺牲人数 30 万，从而与日方委员相对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唯有《产经新闻》(2月1日)发表社论《日中历史共同研究 质疑“南京大屠杀”达成一致》，对《报告书》日中双方一致认定南京事件为历史事实提出异议。《产经新闻》把立命馆大学的北村稔和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所主张的“南京大屠杀”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宣传内容一说作为“近来实证研究”之例，仍然主张南京事件否定论。北村与东中野两位的虚构说，正如拙著《南京事件论争史》中所批判的是“虚假的把戏”一样，是历史学中已经站不住脚的谬论。《产经新闻》声称“虽然《报告书》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认识达成一致，但那是参加共同研究的学者之间的事。希望避免出现将其作为历史事实那般在日本的教科书等领域中独步的情况”。其竭力否定《报告书》意义的做法正是畏惧《报告书》的佐证。

日本报纸除报道南京事件相关内容，还一致地进行了如下报道。把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成果有限的原因归结于中方社会体制存在障碍。这些从它们的社论中可看得出。比如“原本对于独裁国家的中国与学术自由的日本之间无法期待会出现什么大的成果”(《产经新闻》社论 2月1日)，“与在共产党意识形态下进行历史解释，学术自由受到限制的中国之间拥有共同的历史认识，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读卖新闻》社论 2月2日)，“发起于政治主导，对方又是学术表达不自由的中国。日本专家自始就对能否取得成果抱有疑问”(《朝日新闻》社论 2月2日)等等。

日本报纸非但对《报告书》证明了自民党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失败这一重要成果不加赞扬，还降低对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评价，转移国民关心视线，这种报道行为令人感到遗憾，只能说其丧失了“权力批评、监督”之“媒体精神”。

#### 四 需要日本政府作出的诚实应对

如前所述，在日本，以自民党国会议员为首的政府方面放任官方否定南京事件真实性的言论，保守派媒体宣传“南京大屠杀的谎言”，以“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中捏造出来的”而试图从国民的记忆中使之忘却、抹煞掉，类似的政治冲动接连不断。但是，这些行为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了南京事件的受害者、受害国中国的国民，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与猜疑、抵抗。日本国内还以政治家、大学教授为中心四处散播非学术性的否定论，保守媒体反复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谎言”宣传，虽然不少日本国民受其影响，但在国际上却损害了对日本社会的评价。

《报告书》已经确认了南京事件为历史事实，所以下一步要求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们用行动来表示认定南京事件真实性的政治态度，实现政治解决，同时将其反映在政府的历史政策中。

具体来说，第一，改革文部科学省的教育行政，在日本学校的历史教育中，认真教授南京事件或者说至少不予施加压力或统制。第二，采取坚决措施保证描述南京事件的电影《拉贝日记》(德国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南京！南京！》(中国导演陆川)等外国电影能在日本国内的电影院中安全上映。畏于右翼势力的武力阻挠等活动，一般电影院都处于上映困难的境地，所以上述电影至今尚未在日本公映。前者在德国、法国还有中国都成为热门话题，许多国民都已观看，但在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南京的真实》可以毫无阻碍地上映，但描写真实的外国电影却无法公映，处于一种很难说是非常“成熟的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政治家非常喜欢用的词)所做的令人感到羞耻的社会状况中。

## 五 怎样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共同历史认知

日本各报纸为强调《报告书》中所表现出的日中双方历史认识上的鸿沟,对中方称南京大屠杀牺牲者人数为30万以上,日方称2—20万一事作了大肆报道,这是不对的。日中双方都以东京审判与南京军事审判的判决书作为史料,明确指出前者记录为20万以上,后者记录为30万以上,在这一点上双方并不存在分歧。日方论文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当地的华中方面军在进攻南京的作战指挥及军纪混乱方面存在问题,同时中方军队存在的次要原因起到了配合的作用。对此,中方论文则是以日军实施的实质上的虐杀、残暴行为为认识前提,不关注对原因的分析,因此通篇侧重于对屠杀行为内容及规模的叙述,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

中方的论述是“以史为鉴”这一中国传统的历史史观为基础,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异曲同工之意,在于以史为镜,把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作为一面镜子,汲取教训。南京大屠杀是象征日中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虐杀、残暴行为,让人产生犹如图片般鲜明印象的事情。<sup>①</sup>对中国来讲,似图片影像般清晰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形象,在以此为训不忘日本侵略,争取成为强国不再遭受侵略这一点上意义重大,所以对还包括偶然因素在内的事件发生的原因不太关注。而且由于是象征日军残暴的事件,所以对日方论文中指出的中国军方的次要原因,中方还有可能会认为是要将责任转嫁给中国。

另一方面,日本的历史研究会认为若不弄清楚事件是因何、如何发生的,对事件本身的考证就应看作是不充分的,因而格外致力于阐明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希望给出有说服力的叙述。另外“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这一目的与方法和中国也不相同,日本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或行为过错,了解原因,以学习防止再犯同样错误的智慧,指导自己的行动。

但在中国学者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残暴性不言自明,毫无意义的详述原因、经过会使对最为重要的屠杀行为的叙述减少,另外对偶然性、突发性因素与经过的执著,还会受到批评是在替日军的罪行辩护。

虽然日中双方的论文存在分歧,但日方论述了为何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会发生南京大屠杀,中方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是如何进行的,两者可互为补充。

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日中两国人民若想形成历史共识还需要:

第一,如实地回忆在南京大屠杀中毁灭的个人、家庭、百姓、士兵们的痛苦、悲伤,将牺牲者每个人的苦楚与不幸牢记心头。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数为30万也好20万也好或者是几万也好,这种讨论缺少对死难者的敬畏,带有把牺牲者当作一个整体化数字处理的倾向。笔者曾亲身访问过南京当地,采访过27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亲属,深刻理解受害者不单单是一个数字,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相、性格、姓名,拥有各自不同的人生;由此笔者还理解到受害者他们无可取代的家人、生活与人生就这样在日本兵的暴力下遭到践踏是多么残酷和悲惨的事情。<sup>②</sup>

如果日本人也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牺牲者着想,悲他们之悲、他们之不幸,应该能够与中国人形成共识。目前挖掘、收集与出版证明牺牲者个人资料的工作在中国有了显著发展,对姓名与长

<sup>①</sup> 虽然《报告书》中的中方论文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依然使用了“南京大屠杀30万人”给人以图片影像式的印象。“屠杀30万人”所描述出来的规模之大是重点。

<sup>②</sup> 参拙著《体験者27人が語る南京事件 虐殺の「その時」とその後の人生》,高文研2006年版。

相都明确的 2718 名受害者、经历者的采访资料共六卷收录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sup>①</sup>，遭杀害个人的姓名、职业、年龄、被害场所、被害方式的记录卡片共 13000 多份，计有八卷也被收录在同一史料集中。<sup>②</sup> 通过这些庞大的史料，使人们能够回想起牺牲者每个人的姓名与悲剧。

第二，多视角的历史认识。把南京大屠杀与全世界发生的战争与屠杀尤其是军队对平民的屠杀事件作比较，去认识不仅是日本兵，军队这种武装组织普遍带有非人性、残暴性及其根本性质的共通性，与此同时再去认识日本兵所固有的侵略性、残暴性。

如 2007 年，以律师、学者、教师、市民为主，组织了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世界 10 个国家召开的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为法西斯国家的德国、意大利在战争期间出于憎恶与军事暴力虐杀市民的事例相比较，对日美马尼拉战争中虐杀市民、日军在新加坡屠杀华侨，还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屠杀百姓等作比较，进行探讨，尝试与以人权、和平、正义为目标的世界人民共有一种历史认识，以推动构建和平的对话与联系。<sup>③</sup>

作为该研讨会的一部分，2007 年 11 月 24、25 日两天在中国的南京大学举行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史料的研讨”学术讨论会，由中日两国学者、教师、市民参与报告。中国最早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者之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对自己曾经提出的 30 万这个数字，根据新的历史资料提出疑问，提议重新探讨；还有报告称应该与世界各国的首都、大城市中的屠杀事件进行比较，以国际视角探讨南京大屠杀，在学者层面扩大了对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相同历史认识的范围。

反观之，日本的国会议员联盟南京问题小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称以反日为目的摄制的南京大屠杀“宣传电影”“不仅是对过去日本人名誉的贬低，也使得现在、未来的日本人始终处于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残暴民族的危险境地”，开展运动阻止在日本国内公映。想起这件事，不难看出他们的历史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让国际社会哑然失笑亦或冷笑的水平。

(作者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译者高莹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25、26、27——幸存者口述（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收录了对 1600 人的访谈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37、38、39——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收录了 1118 人的访谈资料及人物照片。

②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48—55 卷——遇难同胞名录（I—VIII）》（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2007 至 2008 年在十个国家召开的国际研讨会记录已由记录集编集委员会编集成册：《南京事件 70 周年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の記録》，日本评论社 2009 年版。